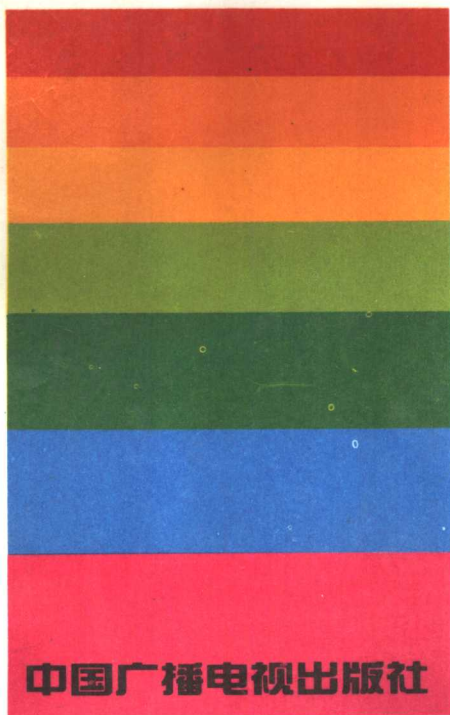




说听之间

韩泽 著



说 听 之 间

韩 泽 编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说听之间

韩泽 编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36)

北京顺义燕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 10印张 217(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定价: 4.85元

ISBN 7-5043-0997-4/H·46

前 言

我于1950年踏进广播界的大门，先后在无线广播、有线广播、电视广播和广播电视管理等岗位上工作，到现在40年整，可说是一生许给广播了。今后的岁月也仍然会奉献于她的。我爱这项事业。

年轻的时候，记不得从哪篇文章里读到一句话：用研究的态度对待每一件工作。我把它写在日记里，也从此养成了多思的习惯。广播电视是这样地神奇，我们还不善于驾驭；它深藏的能量，我们大概才开发了一点。多少课题等待我们探讨啊！可是，尽管脑海里思絮翩飞，笔记本上题目排队，写下来的却不到十分之一。既因生活得太累，也怪笔头还不勤奋。

在出版社的鼓励下，我把旧作翻检一过。慨叹的是当记者年月所写新闻、通讯、报告，大部分已失去再读的价值；稍获欣慰的是所写研究性文字，今天多数还能成立。别去三分之一，留下的分为四辑：“视听界评议”是近两年所作，是针对界中大事或某些倾向而发的，“论述”、“杂说”二辑时间跨度较大。前后约30年，所涉较广，但总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广播电视怎样认识自己的工作规律，怎样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得更有成效。“调查·考察”，是80年代对外间同业的考察与思考。

各部分都有关于农村的题目，篇幅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因为我从事广播工作的大部分时间是与农民打交道。60年代初，江苏台《农村节目》有过一番改革，引起全

国同行关注,也引发了一场争论。《广播业务》杂志就此组织了为期一年的讨论。在我印象中,这是迄今为止广播界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学术与业务讨论。温济泽、何光等同志均曾参加。梅益同志十分关心这一讨论,曾于1961年秋来江苏,听了汇报,看了稿件,听了录音,作了热情的讲话予以鼓励。这场讨论最后没有作什么结论,以发表书中《〈农村节目〉一年回顾》告一段落。今天通过这篇文章,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当年广播界面对的问题,人们探索的方向与思路。因为是将近30年前的事了,所以向读者交代几句。写作《一年回顾》之后的20年,我写了《广播和农民》,又过了将近10年,写了《关于省级电台农村节目的思考》。广播电视如何服务于农民,一直是我萦回脑际的一个题目。这是一门大学问,我才粗浅地接触,且寄希望于来日。

我不习惯写构架严整的文字。书中除少数几篇外,大多用随笔体写成。写起来方便些,读起来也轻松些吧?第三辑中的《说听之间》,其实是关于广播特点的一篇论文,我把它随笔化了,自己倒还喜欢,因而拿它做了书名。它也大致概括了本书的内容:研究广播,简单说来,不就是研究说与听之间诸种现象和关系的学问么?

在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50周年前夕,我把这束文字呈献在读者面前,是想表示:我亟愿追随在我国广播电视理论大军之后,为广播电视理论建设做点什么。做什么呢?我将开始有点余暇,也可以自我规划一下了。

作者 1990.9.20夜

目 录

前 言

一、视听界评议

一句大实话.....	(1)
创收与团聚力.....	(3)
大任务, 大舞台.....	(4)
丰收·思索.....	(6)
天职.....	(8)
“扫黄”以后.....	(10)
“长寿论者”言.....	(12)
航标.....	(14)
实实在在 服务农业.....	(16)
以农民为师.....	(18)
恼人的“浮华八股”.....	(21)
来自现实的迫切呼唤.....	(23)
视听界的盛事.....	(27)

二、论 述

自己走路, 走自己的路.....	(29)
广播电视与民主建设.....	(38)
新闻题材规划略论.....	(50)
新闻题材规划的实际根据.....	(60)
对话源流考略.....	(67)
广播对话三探.....	(72)

真实性的三重含义	(82)
记者工作八题	(86)
把话说到农民心里去	(95)
《农村节目》一年回顾	(101)
广播和农民	(128)
关于省级电台农村节目的思考	(142)
谈形势宣传改革	(148)

三、杂 说

社论改编及其他	(153)
天地广阔	(161)
读书随感	(165)
如闻其声	(169)
“断手复活”的启示	(176)
说听之间	(180)
细水长流，点滴入土	(192)
说话和气	(196)
春风化雨	(200)
语言小议	(203)
杂谈趣味	(208)
新闻三记	(212)
不穷视听界 焉识宇宙广	(219)
“金陵之声”特色刍议	(220)
月末的喜悦	(224)
与邱德根先生交谈之后	(226)
《独居户》的魅力	(230)
《鳊鱼苗》的另一种信息	(234)

政治意识	(237)
隔与不隔	(240)
漫话录像放映	(243)

四、调查·考察

香港新闻界考察记	(248)
----------------	---------

一、视听界评议

一句大实话

不久前，美籍华裔新闻学教授黄纪瑞先生来南京，与南京新闻界朋友相会。一位年轻的记者提问：“如果记者编辑与领导的看法不一，稿子被卡住，怎么办？”黄先生爽朗地笑道：“这好办，谁权大，听谁的。美国也是这样。”好一句大实话，道出了中外皆然的一个简单的道理：新闻单位是要有权威的。

这些年的新闻改革，给新闻界添注了活力。就管理而言，领导放手多了，记者编辑们活跃多了。但又时而听到一种说法：“领导何必还要审稿，文责自负嘛！”有的同志把自己承办的节目看作“自留地”，说“这20分钟我管了，领导不要干预。”，行动上设法回避领导审阅稿件、审听或审看节目。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两个方面：有的领导责任心不强，你急他慢，常使一些抢手新闻失却了时效；有的领导谨慎太过，使一些个性鲜明的文字被磨得毫无生气；有的领导不大学习，不明新闻改革大势，记者编辑的创新尝试常常碰壁。这都叫人扫兴。在记者编辑方面，有些同志特别是有的年轻人，则希望无拘无束，希望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写怎么播，不愿接受审稿制度，并希望照这样来“改革”、“开放”。

前一种情况，亟待有关的领导加以改进。后一种情况，

我要说这是不现实的。一个台几十个节目，如果领导概不闻问，听任各行其是，各唱各调，岂不乱了套？而且任何节目都只是一个台的组成部分。我们提倡每个节目都办出自己的特色和个性来，但它们又都必须符合一个台的总的特色和“台性”。作为人民的广播电视台，它的基本特色和“台性”，便是它的全部内容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和宣传方针，必须对社会和人民负责。领导审稿的任务首先正在于此。“文责自负”的勇气可嘉。但如果是上述的这种责任心，那么由领导从他的水平上再审查一遍，岂不可以负责得更好？

何况这又是纪律。党和国家委派某些同志在此领导——包括审定节目，他们是负有责任的。为了保证人民广播电视台的特质和“台性”得以体现，权威和相应的纪律是不可少的。

其实有的同志讲“文责自负”时，并没有严肃考虑过应负什么样的责任。比如为了追求“轰动效应”，竟播出了无版权的、内容也极不妥当的海外片，有的为了赞助或谋私利，搞出有偿新闻……他追求的“效应”达到之日，便是台声大损之时。有时损失的不仅是台声，而且是党和国家的声誉。这都提醒我们，台、部领导对节目的审查是必要的，必须坚持的。

领导人既要坚持宣传工作的大原则，又要倡导和支持改革创新，审稿中有不当之处，要听取下属意见，努力改进。记者编辑既要大胆创新，又要遵守审稿制度。领导提出的意见要虚心听取，一时未能接受，不宜僵持争执，还得先行服从。

广播电视台也正在改革之中。由于它们的一言一行影响至大，改革更须有秩序地进行。改革可以议论纷纷，工作中的权威和纪律则要进一步加强。

☆本文与新华同志合写（1989年1月）

创收与团聚力

在改革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分配不公的状况，引起诸多矛盾。在广播电视台内，也见到些苗头了。

过去不搞广告和经营，如今搞了起来，每年创收不少，一定程度地弥补了事业经费的不足，也改善了职工生活。但职工收入的差距日见增大。直接创收的如广告经营部门，照例多得酬劳，还有其他一些好处，先“富”了起来；某些栏目可以搞特约播出之类的，也有了较多收入；不可能与外间发生经济关系的则终年清苦。如果差距的拉大是因为贡献有别，自然十分合理；但现在相当程度地是因为机遇不同。于是有了第一、第二、第三世界之说，也有戏称一等、二等、三等公民的。戏称的后面藏着不平的情绪。加上有的领导单纯依创收论成绩，使不公超出了经济的含义；而有些创收多、收入高的部门和同志，得宠于领导而不知检点，盛气骄人，台内不平之气更甚。埋怨，愤然，部门间关系紧张，时可闻见，诸多误会也由是而生。据说有一发射台的值班人员竟做出拉闸的举动，卡断广告，企图迫使领导重视，解决收入差距太大问题。这种做法不顾大局，违法违纪，自然是干不得的。

但收入差距不合理问题确是存在，并因此而妨害了团结，不可不加以注意。在这里想对三方面的同志各说几句话，是耶？非耶？聊供参考。

直接搞创收的，不要过于夸大了自己的作用。一是国家给了频率，给了我们在电波世界中的位置，广告才显出威力；二是经过许多同志努力，办出若干好节目，拥有大量听

众观众，广告才有了依附。自己固然有贡献，但要看到国家给的特殊条件，看到他人的作用，要谢谢他们，自己宜乎谦虚谨慎。

不直接创收的，要看到搞广告和经营的同志确实辛苦，花费也大，不给他们以鼓励如何能够多创？而他们所创绝大部分都归了台，除了补助事业之外，盖宿舍，增奖金，谋福利，大家都是有的。说“他们有什么特别本事，我去也能干”，有的同志这样讲确是事实；但那时换了个位置，人家不也指着你怎么？还是一样。

当领导的呢，一要注意上下左右的沟通，让大家彼此理解，彼此承认，并要及时消除误会；二是分配上，既要有合理差距，又要让各部门都有奔头，均衡发展。所谓都有奔头，并不是都去直接搞钱，我是主张创收的对外窗口只设一到两个（广告部与经营部），其余部门则把增加收入与高质量地完成本职工作挂起钩来，引导大家都在本职工作上下功夫。领导还要特别关心那些最清苦的部门，比如发射台，要给开辟增加收入的途径，如设节支奖、安全播出奖、技术革新奖，有条件的也可从事对外技术服务。

创收工作开展好几年了，今后还会创出更大的局面。我们要取得经济收入与凝聚力的双增长，才算是胜利。如果经济收入增加而人心日益涣散，团结日益削弱，那就得不偿失了。

（1989年3月）

大任务，大舞台

农业是国家命脉所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中，

前六年农业的步子迈得很好；后四年却徘徊不前。每个老百姓都已感受到粮食形势的紧张了。农业战线已经发出警号：如不着力发展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说不定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就会使整个改革大业受累。

为此，北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夺取今年农业丰收的动员令。广播电视台站的同志都正为此目标克尽自己的力量。县级台站最接近农村，把夺取农业尤其是粮食的丰收，放在宣传报道的首位是恰当的。

这几年，一些台站的农业宣传淡薄了一点。在人力配备上、报道份量上、时间安排上都有所表现。不管由于什么原因，现在都该改变了。

广播电视工作者首先要对农业为基础的问题作一番再认识。这方面，田纪云同志的报告，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已有详细阐述。总之，在我们这样一个11亿人口的大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对农业有稍许的轻慢。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还须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

有同志说，经过十年改革，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这是误解。农业自身的深化改革固然有许多文章要做；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还须全社会为它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这方面待解决的问题更多。广播电视工作者只有认识到这些，才能自觉而郑重地把农业宣传列为重大课题。

有同志说，当前宣传是以“治、整、改”为中心，现在又强调农业，位置怎么摆？其实，“治、整、改”的实质是调整。过热的要压要下，偏冷的要保要上。农业就是要保要上的方面。人们所希望的“治、整、改”的成果之一就是农业得以加强。农业宣传的位置怎么摆也就很清楚了。

加强农业宣传不只是增加份量。这很容易。重要的是针对性。内容上、方法上都要十分讲究针对性。不仅使听众入耳入脑,而且能够真正有助于唤起全社会对农业的重视,有助于鼓舞农民热心农业,有助于推进和深化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助于促进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有个较大较快的发展。

这就要我们使出浑身解数。

经过十年的新闻改革,我们已经增长了许多经验。新闻改革,无论起初的新、快、短、广,也无论近期的增加开放度,组织社会协商对话的报道和加强舆论监督,都是为了服务于宣传报道的任务和目的而进行的,也只有以宣传报道的实践为凭借才能得以施展。加强农业的宣传报道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也正是新闻改革的大舞台。我们不妨把从新闻改革中把握的十八般武艺用到农业宣传报道上来。在这方面取得突破,赢得效益,无疑是新闻改革取得成效的重要标志。

(1989年1月)

丰收·思索

——写在优秀广播节目评选之后

1988年全国优秀广播节目评选结束了。170件获奖作品,标志着这年广播节目的新水平。我们从中看到,广播在反映现实的广度、深度、真实度和敏锐度上都有了新的拓展。

《独居户见闻录》带我们走进了今日桃花源。它有桃源的深幽,却又是与外界沟通着的。我们看到,改革的春风怎

样吹进了深山最深处，我们也看到了，朴实的山民们是怎样切实地建设着社会主义。“见闻录”给予我们的最突出的启示，也许是关于形势宣传的了。多少年来，形势宣传是我们用力最多而收效最次的。这篇报道不事虚张，不用说教，只是把山区见闻娓娓道来，却让我们透过一个偏僻角落，惊异地看见了十年来的人间巨变。

《农民黄永洲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质朴无华，对听众心灵的震撼是强烈的。它展示了一个农村党员宏阔的胸襟。他自身文化无多，却充分识得知识分子的价值。他爱他们，尊重他们，在他们屡遭困厄的岁月里，热忱地帮助他们。他的朋友——一批高级工程师们，也许是由于“士为知己者死”的知识分子传统，也许更因为曾在冷漠的现实中从他这儿得到过难忘的温暖，也许还因为这颗明如水晶的心把他们的心灵映照得更加澄彻，他们都以黄永洲所在的上台子村为家，都为振兴农村经济倾注全力，真诚的情感与丰富的知识的结合，上台子村出现了奇迹。这篇通讯对于所有的人都有教益，尤其是各界各级的领导人听了以后，是可以深长思之的。

列入一等、特等的那些最优秀的节目，都给广播工作者带来了丰富的信息。我的最深的体会是：新闻改革需要更多地在内容上下功夫。记者、编辑要致力于经济的、政治的和诸种社会问题的研究。对所报道和议论的问题知之甚浅，而在技巧方法上花力甚多，那样的节目终究是苍白的。

如果说评选是对全国广播宣传的一次大检阅，那么，我们在喜庆丰收的同时，也又一次地看到了我国广播宣传一些严重弱点。比如真实度敏锐度，1988年虽有提高，但是没有太大的突破。特别是把这批具有最高水平的节目放到一年大

势的背景上作一比照，就可以看到，从总体上来说，它们同生活中重大情况的呼应是欠紧密的，反映是犹豫而迟钝的。经济过热，农业滑坡，通货膨胀，物价升幅超过了百姓的承受力……在全社会议论纷纷，人民严重不安的时候，广播里依然是不明朗，更没有及时发出足以令人警觉的警号式的报道，至少我们从参评的二百多件作品中没有见到。

改革中的中国是一艘巨大的航船。记者是站在船头瞭望的哨兵，应能及时报告将临的风暴和将遇的礁石。我们没有做到。这方面固然存在着困难，但是一天没有较大的突破，广播电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服务一天是不很得力的。

（1989年5月）

天 职

在刚刚过去的政治风波中，广播电视的作用从正反两个方面都发挥得很充分。

拥有如此巨大能量的广播电视事业的技术基础，包括它的采制、传输、发射、覆盖诸系统，是多少年来国家和人民从那并不宽裕的财力中挤出钱来建设成功的，是要用来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一庞大的现代化传播系统，在错误的导向下，也能被用来做有损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的事情。象这次，有的广播电视台就曾一度为动乱推波助澜。

这番经历给予我们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广播电视应当努力维护社会、政治的安定。这是它的天职所在。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动荡百年，人民在有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在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国家民族振兴在望，亟需政治安定，社会安定，以便专心一意地从事现代化建设，使中国臻于富强之境。建国以来40年的历史又已证明，凡政治、社会安定时期，国家发展快，反之就慢。“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又一次深受动乱之苦。走出了这一劫难深渊的人民希望不再有任何的动乱发生了。骚乱、动乱，不仅意味着它们直接造成的灾难，而且意味着停滞、倒退，意味着自毁前程和在世界上蒙受耻辱。所以，安定乃是今日中国和明日中国最高利益之所寄。离开了安定，社会不能保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改革、开放、建设，什么都搞不成。

广播电视界应当具有严肃的历史责任感，应在自己的思想和传播实践中，把安定、改革、发展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尤其在促进民主建设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一点。社会主义条件下，安定与民主是一致的，社会的安定正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广播电视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影响和引导人们维护安定，在安定中搞好改革，在安定中求得发展。

广播电视还可以起“安全阀”的作用，日常地通过报道新闻、反映舆论，通过疏导解释、批评监督等手段，有意识地将酝酿中的诸多社会矛盾加以消解，避免郁积和激化。

当社会发生严重政治事态的时候，广播电视无疑必须旗帜鲜明地维护安定，反对各种骚乱、动乱，引导事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矛盾，走向平息。

我们还须加强敌情观念。这一次的动乱中，《美国之音》之类起了很坏的煽动作用。而我们的广播电视除6月6号以后，尤其在播送了《暴乱真相》的实况录像之后，有力地